

非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流派及评价

张忠祥

20 世纪的史学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非洲也不例外,出现了非洲马克思主义史学。非洲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发展于 70—80 年代,90 年代趋向沉寂。马克思主义史学是 20 世纪非洲史学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在民族主义史学与新史学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肯尼亚历史学家奥戈特(Bethwell A. Ogot)对非洲马克思主义史学予以充分肯定,他说:“马克思主义被视为可以挑战自由主义史学垄断地位的一种理论观点,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的非洲知识分子,他们对非洲和世界各地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理论、发展进程和做法表示不满,并希望通过另一种范式来阐明非洲的发展。”[贝思韦尔·奥戈特:《作为命运的历史和作为知识的历史:历史性问题 and 史学的反思》(Bethwell A. Ogot, *History as Destiny and History as Knowledge: Being Reflections on the Problems of Historicity and Historiography*),基苏木:安杨格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3 页]。

一 非洲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的背景

非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有其深刻历史背景:马克思主义传入非洲,对非洲历史研究产生影响;独立之后一些非洲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对非洲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一种推动;还有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1. 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 19 世纪 40 年代,它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1929 年大萧条发生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广泛拓展。马克思主义传入非洲大致开始于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非洲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民主意识进一步发展。二战后,他们对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表示不满,希望寻求独立自主的道路,而马克思主义给了非洲人民新的希望。

非洲进步青年对于马克思主义在非洲的传播起到了桥梁与纽带的作用。他们到西欧和北美留学,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引进到非洲。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就是他们中的代表,他 1935 年到美国留学,就读于林肯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学校。从 1943 年到 1945 年,他担任美国和加拿大非洲学生联合会主席。1945 年,恩克鲁玛去英国,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学习,并担任西非学生联合会副主席。留学期间,恩克鲁玛广泛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著作。他在自传中写道:他们的著作对于我的革命思想和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马克思和列宁对我的影响特别深,因为我确信他们的哲学能够解决全部殖民地问题。《20 世纪马克思主义》一书的作者格拉塞(Daryl Glaser)和瓦尔克(David Walker)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成为克瓦米·恩克鲁玛理论谱系的一部分”[达里尔·格拉塞、大卫·瓦尔克主编:《20 世纪马克思主义》(Daryl Glaser and David M. Walker, eds., *Twentieth Century Marxism*),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8 页]。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也是这样一位非洲知识分子,他是非洲著名的主张依附理论的学者,同样在留学期间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深受其影响。阿明 1931 年出生于开罗,他的童年和青年时期是在塞得港度过的,他上了当地的法语高中。1947 年阿明离开埃及去法国求学,在巴黎阿明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并于 1957 年获得法国巴黎大学的经济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到了埃及。

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会产生何种影响?英国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曾经做了总结:一是促进了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从孤立的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二是马克思主义使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三是马克思促进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作用;四是马克思的社

会阶级结构观念以及他对阶级斗争的研究,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五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重新唤起了对历史研究的理论前提的兴趣以及对整个历史学理论的兴趣(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非洲历史学的研究重点一度也转移到农民运动、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及下层人民的生活等方面。

2. 受非洲社会主义实践的影响

非洲国家独立后,第一代领导人看到资本主义的弊病以及社会主义发展国家的成功,纷纷选择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甚至有的非洲国家明确主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非洲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与探索自然而然地反映到学术研究上来,包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历史问题展开研究,这样为非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提供了土壤。非洲社会主义实践分两个阶段。独立之初,“非洲社会主义”浪潮,包括尼雷尔的村社社会主义、桑戈尔的民主社会主义和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他们都注重挖掘非洲传统文化,如尼雷尔的非洲村社社会主义主要是发挥非洲传统文化的互帮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在坦桑尼亚推行乌贾马运动。紧接着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非洲“科学社会主义”,如莫桑比克、安哥拉、埃塞俄比亚等国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的国家,他们认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点。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非洲仍有7个国家宣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它们是安哥拉、贝宁、刚果(布)、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和索马里。另外,至少还有9个非洲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它们是阿尔及利亚、佛得角、利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舌尔、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戴维·奥塔韦、玛丽娜·奥塔韦著,魏培忠等译:《非洲共产主义》,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非洲社会主义实践不可避免地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影响。以坦桑尼亚为例,1967年1月,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发表《阿鲁沙宣言》,宣布坦桑尼亚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坦桑尼亚,民族主义史学很快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转变,罗德尼(Walter Rodney)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主张欠发达和依附理论,既是一位非洲民族主义学派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说明,非洲社会主义和非洲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

3. 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

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爆发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迅速扩大。在欧美各国中,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成就最大。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又被称为新社会史学派,其代表人物有莫里斯·多布、罗德尼·希尔顿、克里斯托弗·希尔、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和E. P. 汤普森等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点主要有: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从事历史研究;发扬了英国经验主义的史学传统;研究下层人民的历史;采用不同的研究角度,或者说跨学科的方法(姜芄等著:《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第5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9页)。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代表人物有勒费弗尔、索布尔、伏维尔等。他们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工人运动史、欧洲1848年革命、巴黎公社和法国大革命史等。法国的年鉴学派公开声明自己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可避免地会对非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影响。因为,非洲无论独立之前还是独立之后,非洲学术界同西方国家的学术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像南非、尼日利亚、肯尼亚等国家的学者不仅与欧美学者有师承关系,而且学术交流也极为频繁。南非马克思主义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关系密切,像汤普森(E. P. Thompson)、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舒拉·马克斯(Shula Marks)等都对南非左翼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英国工人运动密切影响了南非马克思主义的起源[达里尔·格拉塞、大卫·瓦尔克主编:《20世纪马克思主义》(Daryl Glaser and David M. Walker, eds., *Twentieth Century Marxism*),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页]。

二 非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流派

非洲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是在对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中产生的,具有明显的反殖

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色彩,形成了以恩克鲁玛的新殖民主义论、萨米尔·阿明的依附论以及罗德尼的欠发达理论等为代表的主要流派。而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属于新经济史的范畴,其代表人物与作品精彩纷呈。

1. 新殖民主义论

这一学派的支持者认为后殖民地时期的非洲国家仍然是新殖民地,因为它们仍然被之前的殖民者控制。根据这一学派的观点,非洲国家虽然在政治上独立了,但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仍然依赖于之前的殖民者。恩克鲁玛是非洲著名政治家,是加纳的开国总统,同时也是一位非洲著名的思想家,他提出新殖民主义论,成为非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1965年恩克鲁玛出版了一本很有影响的著作——《新殖民主义》。在这本书中,恩克鲁玛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上,吸收了马列主义的一些观点,以非洲为基本研究对象,对新殖民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恩克鲁玛认为,新殖民主义之所以在战后产生与发展,主要是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遭到了全面打击,这使得战前的那种世界体系已经无法继续维持下去。同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又使得非洲独立的国家有了新的选择。因此,老牌帝国主义只有借助新殖民主义来更好地加强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干涉和控制。恩克鲁玛不仅把新殖民主义看作一种统治形式,而且还把它看作是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他认为,新殖民主义的实质是,在它控制下的国家从理论上讲是独立的,而且具有国际主权的一切外表。实际上,它的经济制度及其政治政策,都是受外力支配的。这种情况对新独立的非洲国家而言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些非洲国家仍然受到原宗主国的各种控制。20世纪60年代初,加蓬共和国首任总统姆巴(M'ba)在巴黎作官方访问时十分庄重地说道:“加蓬是独立的,但在加蓬和法国之间,什么也没有改变,一切继续如以前那样。”法农对此评论道:“事实上,唯一的改变,是姆巴先生当了加蓬共和国的总统,和他受到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接见。”(弗朗兹·法农著,万冰译:《全世界受苦的人》,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在恩克鲁玛看来,非洲国家面临的巨大威胁是新殖民主义,这种威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经济领域垄断非洲初级产品的价格,阻碍非洲的发展。新殖民主义利用它们强大的经济实力操纵国际市场,继续扩大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在经济上剥削非洲。其二,文化、宗教等其他领域干涉非洲事务。好莱坞大片、传教、和平队都可以成为新殖民主义的手段,“天字第一号的新殖民主义者就是美国”(克瓦米·恩克鲁玛著,北京编译社译:《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第246页)。恩克鲁玛认为,只有非洲统一才能对付新殖民主义、捍卫非洲国家的独立。他主张建立一个具有统一经济、军事和外交政策的非洲合众国。他说:“我们必须抓住良机……为了非洲的更大光荣和无限幸福,迅速地汇合在一起,建立一个非洲合众国。”首先,“从地区性(如西非)联盟着手,逐步扩大全非洲”“我们的目标是确保非洲的尊严、进步和繁荣”[克瓦米·恩克鲁玛:《非洲必须统一》(Kwame Nkrumah, *Africa Must Unite*),伦敦:海尼曼教育图书出版社1963年版,第217~222页]。恩克鲁玛积极提倡非洲统一,建立一个具有共同经济政策、军事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非洲合众国。由于恩克鲁玛积极反对新殖民主义,倡导非洲统一,被新殖民主义视作眼中钉,1966年其政府被政变所推翻。

2. 依附论与欠发达理论

非洲国家独立之后,并没有实现经济上的快速发展,非洲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反思,认为非洲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依附关系,非洲的欠发达是资本主义剥削造成的,要实现非洲的自主发展,必须打破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这就是依附理论与欠发达理论。依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拉丁美洲,它是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积累运动在不发达国家特殊表现形式的一种理论,后来依附理论扩展到包括非洲在内的其他地区。

萨米尔·阿明是主张依附论的非洲著名学者。他著述颇丰,主要有《世界规模的积累》(1970)、《不平等的发展》(1973)、《帝国主义和不平等的发展》(1976)等。阿明认为,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由“中心”和“外围”两种“社会经济形态”构成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中心”利用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剥削“外围”,从而实现其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而“外围”的经济发展则被“滞阻”,并处于对“中心”的依

附地位。在阿明看来,这是发达与欠发达的根本原因,欠发达国家只有摆脱这种依附关系,才能获得经济发展。阿明认为中心国家利用五大垄断,即技术垄断、金融垄断、自然资源垄断、传媒和通信垄断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垄断来维护自己的中心地位。外围对中心的依附,尤其是对中心的金融依附,造成外围的利润外流,因此增长就会受阻。第三世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也改变不了依附关系。进口替代是根据特权阶层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根本无视广大群众的需求。那么,外围的出路何在?阿明的结论是打破世界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外围国家才有发展的可能。他说:“对世界规模的积累的分析表明,这种积累总是对中心有利:不是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提供资本,而是相反。这就说明了后者的‘阻滞’,说明了‘欠发达’的发展。由此可见,外围国家只有走出世界市场,发展才有可能。”(萨米尔·阿明著,杨明柱、杨光、李宝源译:《世界规模的积累——欠发达理论批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17页)其实,阿明这个结论是说,发展中国家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发展自己。

欠发达理论以罗德尼为代表。沃尔特·罗德尼1942年出生于圭亚那,1966年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获得博士学位,进入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院任教。罗德尼在《欧洲是如何让非洲欠发达的》(1972)一书中,结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寻找非洲落后的历史根源。他认为欧洲列强在非洲的活动,并没有在非洲创造资本主义,相反,它的长期剥削使非洲陷入了不发达的境地。即使非洲国家独立之后,仍然受到前宗主国的经济剥削,这种不平等的经济关系仍然在延续。他说:“今天,在许多非洲国家,尽管外国列强的军队和旗帜不在了,但这种外国人的所有权仍然存在。只要土地、矿山、工厂、银行、保险公司、运输公司、报纸、电站等为外国人所有,非洲的财富便会长期地外流到这些人的手中。换言之,即使没有直接的政治控制,外国投资也将保证自然资源和非洲劳动力生产的经济价值流出这个大陆。”[沃尔特·罗德尼:《欧洲是如何让非洲欠发达的》(Walter Rodney, *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华盛顿:霍华德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22~23页]除非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链条被打破,否则殖民主义的未来是不能被改变的。

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约翰·伊利夫(John Iliffe)在20世纪70年代也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他在《现代坦噶尼喀的农业变化》(内罗毕,1971)和《坦噶尼喀现代史》(剑桥,1979)两部著作中认为,坦桑尼亚的贫困是发达国家对殖民地的剥削造成的,其思想与罗德尼的观点如出一辙。

3. 新马克思主义学派

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也被称“修正主义学派”“激进派史学流派”等,它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南非,是在对南非自由主义史学的批判过程中产生的。该学派前期比较突出的学者有哈罗德·沃尔普(Harold Wolpe)、弗雷德里克·约翰斯顿(Frederick Johnstone)、马丁·拉盖西克(Martin Legassick)等人。后期,有四位骨干被称为“四大金刚”,他们分别是:罗伯特·戴维斯(Robert Davies)、大卫·卡普兰(Dave Kaplan)、迈克·莫里斯(Mike Morris)和丹·奥梅拉(Dan O'Meara)。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强调用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南非阶级和种族的关系,反对以文化或种族主义来解释南非现状[威塞尔·维瑟:《南非史学的趋势与历史研究的现状》(Wessel Weiser, *Trends in South African Historiography and the Present Sta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北欧非洲研究所报告,瑞典乌普萨拉,2004年9月23日]。

这一学派的产生根植于南非日益高涨的有色人种反抗种族隔离统治运动。随着1948年南非国民党的上台以及种族隔离制度的强化,随之而来的是黑人抵抗运动增加,马克思主义在南非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在此背景下,南非共产党中说英语的党员开始撰写关于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历史。西蒙斯(R. E. Simons)在《1850—1950 南非阶级与肤色》(1969)一书中,以黑人反抗白人政权和政策的视角讲述过去的这段历史,并从阶级角度分析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失败的原因。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是对自由主义学派的超越。他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进行史学研究,解释南非历史,认为南非历史研究要追溯其根源,并提出南非历史是由国际资本主义和南非资本主义创建的等级支配的社会里阶级斗争的历史,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征服策略是密切相关的。他们把南非黑人看作是这片土地唯一真正的居民和继承人,与资本主义相关的白人只能在历史舞台上占据一小块空间。

约翰内斯堡的金山大学历史工作坊聚集了一批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史学工作者,该工作坊由这所大学社会学系的贝琳达·博佐利(Belinda Bozzoli)指导。第一次在1978年举行,此后每三年一次,他们不关注伟人和精英的历史,也不关注旧式政治历史。1976年索韦托起义之后,作为回应,他们开始着手研究特定的非洲乡镇的历史和早期城市斗争的历史,而在主要都市地区大规模棚户区的增长促使一些史学家去研究非洲人向城镇移民的历史和那段历史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金山大学历史工作坊第一本论文集《劳工、乡镇和抗议:威特沃特斯兰德的社会史研究》于1979年出版。这本书在分析问题重点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

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试图撰写“自下而上”的历史或者“底层”的历史,关注“普通人”的历史,无论他们是否有正式的工作,是警察还是罪犯,是住在自己的住宅里或是出租屋里,无论是过得相对舒适还是贫穷。他们试图从历史叙述的缝隙里重新获得这些人有过的经历,特别是被边缘化的人和失去产业被逐出的人,从佃农和农民到匪徒和保育员。在20世纪70年代末,对下层民众历史的重视与新社会史的兴起密切相关,它试图捕捉城镇普通居民的日常经历和意识。

20世纪80年代,南非局势的特点是反复出现广泛的反对种族隔离统治的抗议浪潮和国家层面镇压行动。与此同时,南非经济陷入了真正的危机。这种情况影响了激进派史学家研究题材的选择,使新的主题成为研究焦点。例如,无产阶级化进程、工业化的社会效应、黑人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文化、大众运动的优势与缺陷、黑人政治意识的发展、农村被遗忘了的斗争等成为热门的研究领域。约翰斯顿的《阶级、种族和黄金:南非阶级关系和种族歧视》(1976)是对20世纪早期南非黄金矿业中阶级关系的研究。戴维斯(R. Davies)在《南非资本、国家和白人劳动力,1900—1960》(1979)一书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通过研究资本、国家和劳动力三者的互动关系考察了南非工人阶级分裂的过程。丹·奥梅拉(Dan O'Meara)在《大众资本主义:1934—1948年南非白人民族主义发展中的阶级、资本和意识形态》(1983年)中研究了南非国民党内部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利普顿(Merle Lipton)在《资本主义和种族隔离:1910—1984年的南非》(1985)一书中则对白人农业资本、矿业资本和制造业资本以及白人劳动力等各方利益进行了分析,揭示了白人寡头统治与种族隔离制的关系。

种族分离(Segregation)和种族隔离(Apartheid)在南非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确实起到某种推动作用,但它是极其不人道的,对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政治经济权力的侵犯。到了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种族统治阻碍着社会发展,尤其不能满足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需要。哈罗德·沃尔普的《种族、阶级和隔离国家》(1988年),即以此观点为基础。

南非马克思主义的鼎盛时期是在20世纪70—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全球史学转向的影响,修正主义学者的主题越来越多样化,除了政治经济问题之外,还有诸如环境、性别关系、健康、宗教、种族和身份等社会和文化问题,南非史学越来越转向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所以到21世纪初,新史学在南非占据上风,到这时“几乎没有学者公开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基克·赫利克、皮特:“马克思主义的过去和现在”(Kirk Helliker and Peter Vale,“Marxism Past and Present”),《论题十一》(Thesis Eleven)第1卷(2013年),第25~42页]。然而,这并不表示所有人都放弃了激进的史学研究,更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史学新的勃发。

三 非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评价

非洲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与非洲社会的实际相结合,聚焦资本主义、新旧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等问题的研究,以寻求非洲的真正出路。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等既有相同点,又有更多的不同之处,因为它产生在非洲,具有非洲特色。

1. 它是全球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部分

从全球范围来看,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从19世纪40年代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大萧条之后向世界各地传播,到20世纪中叶发展到高峰,不仅有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而且有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

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另外,还有在非洲、拉美等第三世界的传播和发展。20世纪末,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空前挫折而走向低潮,但同时也预示着它必将从挫折中再度崛起。非洲马克思主义时间虽然不长,前后30余年的时间,仍然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产生了像恩克鲁玛、罗德尼、萨米尔·阿明这样世界知名的思想家和学者,恩克鲁玛的新殖民主义理论、罗德尼的不发达理论以及阿明的依附理论,在今天仍然有学术生命力。因为新殖民主义仍然存在,非洲仍然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外围,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地区。而南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多地属于新经济史的范畴,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又有千丝万缕的连续联系,它们互影响、相互促进。

2. 它是20世纪非洲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非洲史学发展大致有四个阶段:殖民史学、民族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第三个阶段,介于民族主义史学与新史学之间。当然,有的时候,这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因为非洲民族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线不是完全泾渭分明,例如,罗德尼是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之一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一员,同时罗德尼又是非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在非洲史的研究中,南非史几乎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分支。这种独特地位的产生主要是南非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所致,特别是多民族和多元文化使南非的历史研究具有自己的特点(李安山:《20世纪南非史学》,张忠祥等著:《20世纪非洲史学与史学家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第202页)。南非史学流派主要由英帝国学派、殖民主义学派、阿非利卡民族主义学派、自由主义学派、修正主义学派组成。南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对自由主义史学的超越,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把南非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尤其是对种族、阶级与经济发展等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

3. 它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

非洲马克思主义史学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它在英语非洲国家相对发达,法语非洲国家次之,葡语非洲国家几乎未闻。即使在英语非洲国家,也是主要集中在埃及、南非、加纳、坦桑尼亚、肯尼亚等国家。这与所在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以及民众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斗争相联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现实同样为学术研究提出新的课题、新的要求。

四 结 语

马克思主义不仅给非洲历史研究予以理论指导,而且也是新的研究视角和解释方案,推动着非洲历史研究走向深入。比如,通过对抵抗运动中阶级形成的分析,深化了非洲人民反抗殖民主义历史的研究。另外,马克思主义还丰富了非洲人民群众历史的研究。非洲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洲社会主义实践相辅相成,是对非洲现代化道路在学理层面的探索,它希望用另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理论范式来阐释甚至指导非洲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非洲马克思主义史学趋向沉寂,这既与冷战结束之后非洲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动密切相关,因为这一时期西方在非洲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原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非洲国家纷纷改弦易辙;它又受国际史学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非洲学者转向后结构主义的史学方法,注重新文化史的研究。展望未来,随着全球南方的进一步崛起,以及非洲对现代化道路探索的深入发展,非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复兴也是完全可能的。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二战后全球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文献的整理与研究”(22&ZD250)]

收稿日期 2023—10—02

作者张忠祥,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教授。上海,200234。